

新叙事理论译丛

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新叙事学

NARRATOLOGIES

〔美〕戴卫·赫尔曼 主编
马海良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申丹 主编

新叙事理论译丛：跨学科叙事理论

新叙事学

[美] 戴卫·赫尔曼 主编

马海良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1-44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叙事学/(美)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5

(未名译库 新叙事理论译丛/申丹主编)

ISBN 7-301-05450-5

I. 新… II. ①赫…②马… III. 叙述-创作理论 IV. I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3199 号

Narratologies

Edited by David Herman

© 1999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书 名: 新叙事学

著作责任者: [美]戴卫·赫尔曼 主编 马海良 译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450-5/I·0600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6

电子信箱: zb@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62549189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9.625 印张 286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赢、赵梦蕙、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驊、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

HAB02/01

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仲跻昆、刘安武、桂裕芳、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使“未名译库”真正能成为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 年 3 月

总 序

“新叙事理论”指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最近十多年,国内翻译出版的都是西方学者著于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的经典叙事理论,迄今为止,尚未涉足“新叙事理论”这一范畴。本译丛旨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

1999 年秋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叙事理论的代表作 *Narratologies*, 该书主编戴卫·赫尔曼采用了“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这一短语,来描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界,尤其是美国文学界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循环,而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超越。

结构主义叙事学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了一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与传统小说批评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诚然,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叙事学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值得借鉴之处。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批评界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在这种“激进”的氛围下,叙事学研究受到了强

成了一个高潮。一方面国内学者叙事学方面的论著不断问世,另一方面西方叙事学家著于70和80年代的作品也不断以译著的形式在中国出现,其中包括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施洛米丝·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尤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似乎与美国叙事学的复兴遥相呼应,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现了以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为代表的本土叙事学研究的热潮,旨在建构既借鉴西方模式,又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有一个问题,颇值得引起重视:无论是译著还是与西方叙事学有关的论著,一般都局限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忽略了90年代以来西方的“新叙事理论”。诚然,对于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学的研究应当以对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为基础。以前,在国内对于经典叙事学尚未达到较好了解和把握的情况下,集中翻译和研究经典叙事学无疑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从现在开始,应该拓展视野,对近十年来西方新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展开翻译和研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未名译库:新叙事理论译丛”应运而生了。我们编选的这套译丛首批共五种。第一种为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的代表作:J.希利斯·米勒的《解读叙事》(1998);第二种为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代表作:苏珊·S.兰瑟的《虚构的权威》(1992);第三种为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代表作: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1996);第四种为多种跨学科叙事理论的代表作: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Narratologies*)(1999);值得一提的是,“Narratology”(叙事学)这一名词一直被视作不可数名词,但这本书的书名却采用了该词的复数形式。这旨在强调书中叙事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这些研究方法基本都是将叙事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质。第五种为后现代叙事理论的代表作: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1998)。

可以说,“新叙事理论译丛”集后经典叙事理论之精华,是对我国近二十年来引进的西方经典叙事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这些

译著代表了新叙事理论的不同研究派别,角度新颖、富有深度,很有特色。为拓展思路、深化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有更多的新叙事理论的译著和论著问世;同时也希望在建构中国叙事学时,能适当借鉴西方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

在这套译丛的编选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尤其感谢张文定副总编和张冰副编审的大力支持。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朋友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帮助。美国叙事文学研究协会前主席、《叙事》杂志主编詹姆斯·费伦教授直接参与了这套译丛的选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汪民安博士在本译丛的策划过程中,予以了热情支持。北京广播学院周靖波教授拨冗阅读了全部译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在国内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对国内叙事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能起到较强的推进作用。

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我国日益增多的叙事理论研究者和爱好者。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申丹

2001年秋于燕园

引言 新叙事学

戴卫·赫尔曼

1 关于叙事学的两种叙事

1983年,施洛米丝·里蒙·凯南完成了她那部堪称叙事学和叙事理论指南的很有用(被广为引用)的专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书中谈及解构主义对经典叙事学构成的挑战;她希望当时刚刚登上理论舞台的解构主义或许会使叙事理论更加丰富,而不是成为明日黄花。里蒙·凯南显然没有把她那部提纲挈领的介绍性专著看做这个研究领域的终结讣告(130)。大约15年后的今天,里蒙·凯南对叙事学谨慎乐观的预言已经得到验证。似乎可以一言以蔽之:关于叙事学已死的传言实在是夸大其辞了。近年来,我们亲眼看到叙事研究领域里的活动出现了小规模但确凿无疑的爆炸性局面。^①这场小规模的叙事学复兴的标记是多方面的,譬如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对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模式重新思考和重新语境化的论文、专刊、专著;专门杂志《叙事》(1993年才创刊)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从1994年开始出版系列专著——本书也属于这一系列。叙事理论借鉴了女性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学、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计算机科学、语篇分析以及(心理)语言学等众多方法论和视角,不仅没有消亡,反而顽强地存活下来,有时甚至会出现自里蒙·凯南的那部专著出版以来最惊人的变形。^②经过这些年的积极发展,一门“叙事学”(narratology)实际上已经裂变为多家“叙事学”(narratologies),结构主义对故事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已经演化出众多的叙事分析模式。这些模式与结构主义传统形成批判和反思

的关系,从自己意欲超越的分析传统中承接了颇为丰富的遗产。在某种程度上说,本论文集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厘清当前的叙事研究方法所因袭的谱系,记载近年的叙事理论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替换和转换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设想、方法以及目的。

因此,《新叙事学》力求超越两种广为流行但互相对抗的关于叙事学的历史和沿革的复杂说法。叙事学作为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按照第一种说法,术语森严且热衷于严格分类法的叙事学是正宗结构主义的科学诉求的根本标志,而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不错,坚持结构主义传统的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很有用处的叙事分类方案,而且为描述一个特定叙事的具体效果引入了一套颇为精细的分析语汇。可是随着其他一些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潮取得日益突出的地位(譬如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等等),当初以叙事的科学自命的叙事学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落得一个“陈旧过时”的评语。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叙事学已经消亡。按照第二种说法,亦即另一种叙述,叙事学处于危机之中。最近的研究突出了经典叙事学未能涉及或有意回避的叙事的话语方面,其结果是,尽管结构主义传统在叙事分析领域(这里仍然工作着一大批出色的学者)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是按照“危机说”,我们现在必须看到把叙事学用作进一步研究的范式所面临的问题。例如,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旧的叙事学范畴未必能够把握性别问题在故事的生产和处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些研究者把我们对叙事的理解提升为作者、叙述者以及各种受众之间复杂的修辞处理关系。也有的叙事理论家借助于人工智能理论、超文本理论、精神分析学、电影研究以及语言学(包括可然世界语义学和语篇分析)等视角,拓宽和丰富我们对故事范畴的理解,为分析它们的结构和效果提供新的方法。

不难看出,当前叙事研究领域表现出的巨大活力和创新,使过时说和危机说都显得有失偏颇。叙事诗学在过去十多年来发生了惊人的嬗变,到今天似乎完全可以谈叙事学的“复兴”。换言之,叙事学已经从经典的结构主义阶段——相对远离当代文学和语言理论的蓬勃发展的索绪尔阶段——走向后经典的阶段。后经典叙事学(不要将

就是女佣带来的那只猫；于是这里用了一个不确定的不定冠词：“一只青灰色的大猫”。然而，如果这时采用妻子的视角，文本读作……“她抱着一只青灰色的大猫”，那么很显然，这只猫就不是妻子想从雨中找回来的那只猫（在这种情况下，会用到定冠词）。意味深长的是，小说标题里的“猫”前面没有用定冠词，这就使关于小说结尾的两种阐释都没有得到明确的支持。（34）

洛奇确实富有成效地应用了结构主义的理论，他的论文展示了频率和聚焦等概念所能产生的阐释效果。

然而，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全盛时期之后产生的分析工具有助于对海明威的小说提出洛奇未能讨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未能提出，并不是因为洛奇本人的疏忽或无知。应该说，在经典视角的范围之内是不可能提出这类问题的。我们面对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批评家的失败的问题，而是研究工作所受到的一般限制，即叙事研究的可能性条件。因此我的目的不是解决叙事学内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显示后经典方法如何丰富了洛奇所作的那一类阐释。

其实洛奇本人说得很清楚，应该将叙事理论置于叙事历史的实际状况当中，梳理讲故事的技巧和用以研究这些技巧的策略的演变过程。洛奇指出，在先锋派小说家的自觉实验与语言学、民俗学以及人类学的发展——这些发展的结果是产生了我所谓叙事分析的经典模式——之间存在着相互配合的历史关系。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特征是将自己的再现程式隐藏起来，把自身的建构性放在背景位置，转换成一扇面对世界的透明窗户，试图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与此相对照，实验小说则突出自身的叙事结构和作为被建构的故事的地位。这种自觉的小说显然需要叙事分析的工具。当代的创作实践破除了对故事的直接感性体验，把注意的焦点置于读者将某些话语方式阐释为叙事时所依据的各种程式，使叙事结构分析之细密详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正如洛奇所说：

长期以来，小说研究与理论探讨两条路一直是分多合少。然而最近数十年间，本质上以经验和文本为基础，批评成就斐然但理

影响了周边的批评理论潮流,反过来也被这些潮流所影响。随着研究任务的多样化,研究策略也越来越多样化。例如,认知科学、语用学以及语篇分析等领域里取得的最新发展带动了重新探究故事语法的努力。贯穿于这一活动过程的问题也许不再是:“我们能否建构起一种形式装置,以生成所有那些被称为故事的话语单位?我们能否通过这种装置对那些话语单位的更小单元予以结构描述,说明它们的组合和递归原则,进而根据某种规则和形式阐明与叙事能力密切相关的那些技巧和手段?”取而代之的问题是:“叙事话语里的形式标记如何启动已储存知识——例如有关公式化情境和事件的知识,从而使人们能够将故事视为故事?这需要什么样的特殊标记,为什么?某些类型的形式标记是否比别的标记更有助于理解叙事?属于认知、语言和互动技巧和手段范畴的叙事能力与交际能力的一般关系如何?”^②总之,当前的研究表明,我们不仅应该探究故事的结构,而且应该研究读者和听者将叙事结构连接到话语中呈现的某些事件串时采用的程式化的而非随机的方式。我们还应该审视讲故事者如何为了特定叙事目的而利用接受者推断叙事结构所依靠的特殊话语标记。^③

关于叙事语法问题的这个简单说明,显示出叙事学格局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的重新配置。最根本的转换是从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移到形式与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视故事的文本,也重视故事的语境。^④笼统地说,叙事理论家们的重点越来越集中在这一点上,即: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并不单由其形式决定,而是由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因此,核心问题是故事的策划方式及其所引导的故事处理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处理策略可以根据所取视角、所用术语以及所选描述层面,表现为对因果关系的基本假设,亦即关于某个叙事里何人何时做何事的结论,关于叙述者与事件的位置关系的推断或关于叙述者的可靠性(或不可靠性)的推断,关于哪些主题在故事里处于优先地位的决定,对某些类型的叙事结构所引起的比较隐秘的性别反应予以实践或抵制的方式,对故事讲述形式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召唤进行抵抗或接受的方式,对借助各种叙事技巧加以再现、假定、削弱、反讽、使之复杂化或得到加强